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单一的现代性



*A Singular Modernity*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 著  
王逢振 王丽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单一的现代性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 著  
王逢振 王丽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前言：当前时代的倒退.....        | (1)   |
| 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准则 .....       | (13)  |
| 转变的方式 .....            | (81)  |
|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       | (120) |
| 结论：“他的错误在于绝对的现代” ..... | (177) |

## 前言：当前时代的倒退

在十足的后现代性当中，直到最近，对现代的那些特征，尽管已经不再有什么欲望，却似乎一向存在着某种普遍一致的看法，某种未说出来的舆论。例如，现代时期的禁欲主义，或者它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我不太肯定是否统统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时期的极权主义，甚至它的压制性；现代主义美学的目的论——它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更新走向最新；基本上也属于现代主义的最低纲领论；对天才或先知的崇拜；对听众或公众无愉悦可言的要求——所有这些事物（当然它们相互关联，常常是彼此的一些方面或不同的形式）经常被评论家系统地、反复地提起。

然而，在所有这些健康的排斥反对意见的运动当中，实际上，在打破窗子、扔掉旧家具的嘈杂声中，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所有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将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一方面是“理论”或理论话语，另一方面是罗蒂的《自然之镜的哲学》（以及勃迪厄对学科的批判）——无疑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关于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目睹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它起始于古老的亚领域，如伦理道德。<sup>[1]</sup>可是，如果形而上学不是神学本身（对此否定的神学进行了破坏），那么形而上学的回归还



会远吗（新时期对物理学的思考已有暗示）？

同样，某种类似政治哲学的东西也重新出现，随之而来是所有那些古老的机制和文明问题，市民社会和国会代议制问题，责任和公民道德的问题，等等，而这些毫无疑问都是 18 世纪后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sup>[2]</sup> 仿佛在刚刚结束的革命的世纪，人们从它的挑战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虽然它使传统的关于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面对着阶级和集体社会存在的种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所有那些观念性本身对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历史情境——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构成了如此多的反映。如果与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过渡相比，这似乎是有些滥用（无论如何，人们会认为，后者本身不是一种过渡而是一种观念的滑动，从经济范畴滑向政治范畴）。

随着所有这一切，一种旧的政治经济像影子一样蹒跚着走来，并向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惊人的发展，也就是重新发现了市场，某种像新发现了机器轮子一样让人激动的东西：人们无疑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趣味，但没有人会让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期，关于某个米尔顿·弗里德曼、某个哈耶克或某个波普尔（Popper）的思想会有什么闪光的东西。

于是出现了美学的复苏。我们认为，美学是一个现代主义既发明了它同时又解构了它的学科，或者说，各种现代主义的崇高形式就像它们开始出现时那样迅速抹杀了美学问题。然而今天人们再次提出了美的问题，也就是美学的中心命题，而美学的资产阶级动因可以在它孪生的两个极点记录下来：一方面是纯粹的装饰和令人愉悦的平庸化，另一方面是审美判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感伤的唯心主义。

那种（同样在传统上）可以确定为观念历史的东西，在对待这种思想倒退时非常软弱无力，但它常常可以合乎情理地通过政

治联系和机构的力量来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假如它真的失败了）从根源上阻止了许多当代理论的扩展，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即使它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现象学以迂回的方式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大学的行业化（和日益发展的私有化）可以说明对理论能量本身的系统遏制，同它在目的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样，其效果是脱离常规。但是，这恰恰是为什么这种重新制度化及其倒退很难在后现代性的后果中——列举的原因，因为众所周知，后者的修辞强调无中心和偶然性，强调根状的错综复杂，以及异质性和多样性。人们也不可能想像这就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欢呼历史的“宏大叙事”被后现代的多样语言游戏取代时所想的东西<sup>[3]</sup>，因为后现代肯定隐含着对新语言游戏的发明创造，而不是人为地复活那些学术上已成过去的东西。

但是，如果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性——一种不系统的“现实”，充斥着偶然共存的、不可调和的、尼采式的时代现象——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对过去的摈弃，或者对过去的彻底遗忘，那肯定是错误的。实际上，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起被摈弃的，还有哲学、文学和其他形式的历史学的更小的叙事。因为正如后现代性的历史小说一样<sup>[4]</sup>，最后这种历史学要以暂时的、可以随便调用的经典的形式来重新创造，也就是要置于可以同时消解和取代的众多的文本关系之中。对利奥塔来说，对德勒兹也一样，过去的哲学家应该重新发现并以后当代的习惯用语来重写（正如德勒兹非常杰出地对尼采和康德、休谟和莱布尼茨所做的那样），而所用的口号是著名的引语“大胡子的黑格尔和刮干净胡子的马克思”<sup>[5]</sup>。

事实上，像德勒兹一样，在许多方面，利奥塔本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他热情地信奉真正的、激进的、甚至可以大胆



地说是真实的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这种信奉最终标志着二人的政治都是美学的（尽管他们可能彼此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利奥塔对所谓的宏大叙事的先发制人的攻击（针对共产主义和法国的共和主义），结果并不像海湾战争（他也支持）那样确定。因为，为了保持对隐蔽在他明显的政治后现代性之内的美学现代主义的信念（像本雅明有意识的神学隐蔽在他的行动主义的自动信念之内一样<sup>[6]</sup>），利奥塔发现自己必须重新发明一种以著作为基础的最古老的时间性的模式，即循环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适当蛮横的立场权威化：后现代主义不是在真正的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它之前，为它的回归做准备。<sup>[7]</sup>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想到我在这里列举的种种回归的现象。

不过，他的尴尬仍然暗示着两个有用的结论。第一个关系到后现代对本质上仍然是现代主义的新的范畴的依赖，无论用什么样的修辞，它都不可能从“新”的安排中彻底消除这些范畴。这对后现代性来说确实是非常重大或意义深远的矛盾，它不可能使自己完全脱离创新的最高价值（尽管有风格的终结和主体的死亡），因为博物馆和画廊几乎不可能在没有创新的状况下发生作用。因此，新的对差异的崇拜仍然与先前的“新”相交叉，即使两者并不完全相连接。

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谴责历史叙事（及其“萎缩的矮子”或目的论）比在没有历史叙事的情况下做事更容易一些。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sup>[8]</sup>，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新批评派把诗的语言抬高到超过其他语言的做法（诗的语言假定本质上是非叙事性的，其他语言一般是叙事性的话语形式），最终也是通过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生效的，这种历史叙事有些像一种保守的“历史哲学”，旧时英国自耕农的农业秩序中的感性统一（如艾略特、利维斯）



仿佛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打碎了（现在被认为与启蒙运动一致，体现在雪莱之类的诗人的作品里）。这种二次叙事也不只是第二次的意识形态补充。我想尽量作出一种更有力的形式结论，就是说，真正对叙事的拒绝和否认会引起一种被压制的叙事的回归，并可能不顾它自身而以另一种叙事来证实它的反叙事的立场，而论证在体面地掩饰另一种叙事中得到种种利益。<sup>[9]</sup>但是，我并不想对这一原则作某种本体论的阐述，相反，我宁愿以方法论的形式对它重塑，把它作为一种建议，在所有看似非叙事的概念中，尤其当它们直接反对叙事本身时，找出被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叙事。如果说这种建议仍然过于一般或抽象，那么下面我将在当前语境中提出一种更具体的说明（大体上是将阐述的四个准则中的第一个）。

不过，现在应该回到那种语境，考虑在充分的后现代性当中某些过时的、最后的回归或重新发现，这无疑是最具悖论的一种重现，因为它证明是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再现，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天真地认为它已被取而代之。事实上它在全世界都已经重新出现，而且在政治讨论中几乎不可避免，从拉丁美洲到中国——且不说先前的第二世界——无不如此。然而，西方所谓的胜利却不断地以明显的后现代方式受到赞颂，以为它克服了旧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生产率论的价值观，既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又是历史的终结，是唯名论者的特殊和差异的信条，无论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阐述运用的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语言（实际上放弃对左、右的区分常常是这种“后现代”修辞的核心）。在现代从所有的书架和橱窗彻底消失之后，在它退出媒体之后，在除了少数爱争吵的、自称是爬行的知识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驯顺地实现了非现代个性化之后，现代性这一口号的复活还能用于什么目的呢？人们不禁怀疑，这种旧的现代性的语言的重现一定是某种后现代的东西：



因为它肯定不是任何诚实的哲学和历史学对我们最近的过去感兴趣的结果。应该说，我们这里得到的是对现代的重铸，对它的重新包装，也是为在知识市场上重新销售对它的大规模的生产。这个知识市场不仅包括社会学领域的最著名的大家，也包括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里平常的讨论（还包括艺术领域里的一些讨论）。

事实上，发生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原因能足以对它证实。相对而言，后现代性在既定的学科里似乎是个无法否认的概念，因为它的令人厌恶的后果——对晚期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理论阐述与所谓的“相对主义”和社会现实的构成性达成了让步协议——已变得非常明显。即使你们不相信断代本身，现代性的概念——它的世系发展一直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而实际上社会学本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因它成了多争论的领域——似乎也值得尊重并具有相当的学术性。

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动因，更深刻的优势，它们大部分在于新的全球市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同样也在于全球的观念市场。因为现代性概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是现代化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制品）。现代性总是与科技相关（至少在“现代时期”），因此最终与进步相联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进步的意识形态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尤其与科技相关的那些进步的意识形态；其实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自己也对进步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批判性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明的现代化理论，使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得到了某种余生，虽然现代性和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因斯大林主义许诺赶上西方及其工业而经历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形式。不过，对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形式的大肆声张的谴责——在策略上与那种一般的看法相联系，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坏的“普罗米修斯的”意识形态——不应该掩盖与之平行的、对西方现代

化形式的怀疑，生态运动、某些女权主义以及各种左派对进步和工业化的批判，都指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然而，如果你相信“历史的终结”，从你的思想上排除了未来和激进变革（且不说“进步”）的一面，那么很难想像如何能形成一种吸引人的政治计划。

现代性概念的复活是试图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电脑化之前的那种重工业）、普罗米修斯主义和普遍的“对自然的掠夺”都已经遭到怀疑，在这种形势下，你仍然可以提出所谓的不发达国家可能需要期待一种简朴的“现代性”。如果不担心今天世界上能够存在的民族—国家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意义上早已是“现代的”这一事实，而只考虑技术进步，那么受到鼓励的是一种幻觉：西方拥有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东西，他们应该有得到它们的欲望；那种神秘的东西可以命名为“现代性”，并可以由那些被号召销售该产品的人详细说明。

我想对“现代”这一术语更新的有争议的用法以及它给我们造成的混乱重点加以说明。在奥斯卡·拉封丹最近回忆他在新的施罗德执政期的命运时，关于抱怨他的市场竞争对手的广泛流行的描写，其中政府被作为“实施现代化的人”：

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词已经堕落成时髦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下你什么都可以去想。如果你想弄清今天人们称作“实施现代化的人”在现代性的术语下究竟知道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只知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约束。现代性的概念被变成了纯经济和技术的范畴。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解雇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就必须也摆脱在那个领域里的保护。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系统严



重萎缩，因此如果我们想成为现代的，我们也必须大量缩减社会保障。在许多国家，商业税收大量减少，以便企业家不至于离开该国而到其他地方，因此我们也必须成为现代的并减少税收……现代性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服从这种经济制约的词。我们如何一起生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非现代的问题，而且根本不再提出这种问题。<sup>[10]</sup>

在这个语境里，现代这一术语的引入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话语斗争的组成部分（正如在另一种语境里，成功是区分“改革者”和“强硬派”的话语）。如果自由市场的观点可以系统地与现代性相一致，习惯地被认为表现了什么是现代的问题，那么自由市场的人们就赢得了基本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远远超越了旧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假如把它称作媒体的胜利，那就低估了今天对政治斗争的语言和术语的转移。这里的关键是，持对立观点的人在术语上没有去处。自由市场的对手，例如社会主义者，只能被归类为否定或个人的现代范畴，传统主义的范畴，甚或最终被归为强硬派的范畴，因为他们明显抵制现代性的发展。这里从拉封丹哀怨的声调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仅失去了这一基本的话语斗争，而且他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它的基本性质和利害关系。

这是些关于世界现代性的政治力量的看法，而现代性已经在全世界复活，并且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被系统地加以利用。但我想指出，在这种复活中也有某种观念和哲学上的不连贯性。一般抨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左翼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含义是说那些观点陈旧过时，因为它们仍然相信现代主义的基本范式。但这里现代主义被理解为过时的管理严密的计划领域，无论这是在国家管理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美

学方面，它都是一个集权的所在，与非中心化的价值和标志新的后现代机制特点的偶然性背道而驰。因此像拉封丹这样的人是非现代的，因为他们仍然是现代主义者；正是现代主义本身才是非现代的；不过“现代性”——在刚说过的肯定的意义上——是好的，因为它是后现代的。那么为什么不用那个词取而代之呢？

一些明显的答案——理论性太强，还不够大众化或还不够流行，“后”字会自动引起不快的、可笑的、反讽的质疑——我相信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最好通过研究关于“现代性”最有影响的当代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作品来进行探讨。他的作品开始完全是作为对那种现代性的批判，结果他却成了那种现代性的拥护者。在《现代性的后果》里，吉登斯结束了他与后现代的调情，并解释了他为什么觉得这样做更加便利（应该理解的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主要为利奥塔之类的人所拥护）。这里是他的评论：

只是发明新的术语是不够的，例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术语。相反，我们必须观察现代性本身的性质，由于相当具体的原因，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现代性迄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我们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正变得比以往更激进化、更普遍化的时期。我会认为，在现代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不同的秩序的轮廓，那就是“后现代的”；但这与现在许多人所称的“后现代性”大不相同。<sup>[11]</sup>

他的主张可以被重新命名为“激进的现代性”，而且听上去肯定与哈贝马斯的看法并无惊人的不同。关于不完善的现代性，哈贝



马斯常用的说法是“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但哈贝马斯的这种说法仍然有用而含混，它使人们接受现代性未完成的可能，因为它永远不可能由中产阶级及其经济体制来完成。不过，这正是吉登斯想让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对通向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的信念，嘲弄了他喜欢不时应用的社会主义短语。我想补充说，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与他一致：现代性是一系列的问题和答案，它们标志着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的境遇的特征；后现代性是在一种倾向于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東西，它可以概括为两种成就：一是农业的工业化，也就是消灭了所有传统的农民；另一种是无意识的殖民化和商业化，换句话说就是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那么，“现代性”的理论家如何能在其现行的意义上把他们的产品——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的现代性——与可憎的旧式产品区分开来，同时自己又不提出那种后现代性使其不可避免的、严肃的政治和经济的全局问题？答案非常简单：你谈的是“交替的”或“选择的”现代性。<sup>[12]</sup>现在人人都知道这种说法：这意味着对每个人都存在着一种现代性，但它不同于标准的或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式。对于后者，只要你不喜欢什么东西，包括它使你处于从属地位，都可以通过确定的“文化”概念而取消，因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现代性，所以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等等。或者你也可以遵循萨缪尔·亨廷顿的指引，根据各种宗教性质的文化重铸这一切：希腊或俄国的东正教现代性、儒家的现代性，等等，一直到汤因比的数字的现代性<sup>[13]</sup>。但这会忽视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意义，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意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投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这些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投以怀疑，而这个世界已经

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

然而，尽管我相信现代性惟一令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不过我选择另一种使用这个术语的方式，在我看来它非常有用，而且像它最终不可被否认一样具有戏剧性），但下面这篇扩展的文章将以一种相当不同的、非实在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它将对现代性一词的应用作形式的分析，而且明确地拒绝任何预设，例如假定这个词有一种有待发现、认识和提出的正确用法。它是一种方法，将把我们引向美学领域或现代主义里一个相关的概念，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相似的含混性。但现代主义反过来又会出乎意料地把我们引向它自己直接的历史和命运，因此文章的结论可能不像期待的那样，论及新形成的后现代的特征，而是关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概念，我把它称之为晚期的现代主义。所以，这里的计划是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而不是对一个概念或一个词的分析。这种分析在结构上令人困扰的是，就像你观察的玻璃窗格，甚至在你透过它观看时，你也一定同时肯定该物体的存在，但却否认与标示那种存在的条件相关。也许最好承认，围绕现代一词的种种概念同它们的无法接受一样不可避免。

### 【注释】

[1] 最近几年，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越来越多地公开招聘伦理学的教师，其数量比任何其他哲学分支的职位都多。但是，这些职位常常反映的生命科学的问题（医药、基因，等等），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政治的而不是伦理的，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不能把它们交给哲学家。

[2] 我认为伊默斯托·拉克劳或朱迪丝·巴特勒这类人的作品是把理论扩展到一个新的（政治的）领域，但尚未在这个领域里得到发展；而不是对政治哲学中某种假冒的“传统”的发展的贡献。



[3] 见利奥塔著名的《后现代状况》(明尼苏达, 1980)。乔纳森·阿拉克把利奥塔的反重写为“高大的故事”对“虚空的谎言”。也许本雅明的预言也有助于说明问题:“历史的构成可以比作军事制度, 这些制度威胁着日常生活并把它规定到军营。在这种状况下, 奇闻轶事就像是街上的灯光或一种造反。”(*Arcades*, Harvard, 1999; or Suhrkamp, 1983, S la, 3)。

[4] See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Verso, 1992), pp. 366–369.

[5]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et répétition* (PUF, 1968), p. 4.

[6] “Theses on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Schocken, 19).

[7] J-F. Lyotard, “Response a la question, qu est-ce que le postmoderne?” in *Le Postmoderne explique aux enfants* (Paris, 1986), pp. 29–33.

[8] See Jameson, “Introduction” to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op. cit.

[9] 因此我想修正我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里的评论(332~333页), 改为新批评派的超历史主义或反历史主义掩盖了更深刻的行动的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或“历史哲学”。

[10] Oskar Lafontaine, *Das Herz schlägt links* (Econ, 1999).

[11]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1990), p. 3.

[12] 但是,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关于真正文化差异的骗人的看法(与在后现代性中全世界到处出现的迪斯尼化的文化复兴相对), 以及在世界各国为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方式命名的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里的观点是(我们许多人认为它是马克思的观点, 而“英国”本身只是那些道路之一, 而且不是标准的模式), 所有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都是独特的、“惟一的”、偶然的, 由独特的民族境遇决定。

[13]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ulture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王逢振 译)



## 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准则

### (一)

作为一个概念,“现代性”一词经常与现代相关联,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个词实际上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时,不免会大吃一惊。<sup>[1]</sup>基拉西厄斯(Gelasius)教皇一世(公元494—公元495)在使用该词时,它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除了现在在时间顺序中的排列)。现在与最近的过去属于一个连续体,两者都与基督在世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着巨大差别。因此,拉丁语“modernus”仅指“现在”或“现在时”;在希腊语中,不存在指代这种意思的一个对应词,因此,关于该意义的拉丁语与希腊语是一致的。<sup>[2]</sup>然而,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当卡西奥德洛斯写作时,即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以后,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在这位基本上属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现代”有了一个对应词,他称之为“过去”。站在教皇的角度看,哥特人新建立的帝国并没有在基督教传统中形成一种断裂;但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这一特点因此延续至今。对于卡西奥德洛斯而言,这个词充满了后来者因为无法超越前人而产生的忧郁,但这无关重要,在各种文艺复兴语境里(加洛林王朝,12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伯克哈特的意大利),人们欣喜地接受了一种新的历史使命。

这里的一个争议是关于“新”(novus)和“现代”(modernus)的区别。我们能不能说,凡是现代的必然是新的,而新的